

在蔣介石發布繼續北伐的命令第十二天，他期待的一次倒戈在湖北發生了，夏斗寅從沙市進兵武漢。

自四月底以來，擁護他的各地軍隊首領紛紛來電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川軍領袖、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名列其中。

經歷了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軍閥混戰的楊森與他的川軍，在一年前就是最早響應蔣介石北伐的軍閥部隊。當唐生智、張發奎的主力從武漢出發北伐後，蔣介石謀劃趁虛而入，反覆盤算，動用鄂西的楊森最為合適，便命令楊森指揮所部八個師出川進攻武漢。而且蔣介石料定駐防宜昌對付川軍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會舉棋不定，川軍的八師之眾定會讓只有一萬兩千人的夏斗寅反戈一擊。

果然，經過充分運作，夏斗寅的重要助手、副師長兼參謀長萬耀煌等人已心向南京。夏斗寅決計退出宜昌，與楊森聯手進攻武漢。

只是蔣介石沒想到，楊森一面響應南京政府，一面放走了四川老鄉共產黨員朱德、陳毅等人。而正是朱德日後成為了中

國工農紅軍、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並與毛澤東、周恩來等聯手打敗蔣介石的百萬大軍。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夏斗寅奇襲武漢成功，馮玉祥的籌碼就不那麼值錢了。可他沒想到，僅僅兩天，夏斗寅就被北伐猛將葉挺擊敗。他只得搖著頭對身邊的人說：「看來這個『皮包將軍』打仗是不行的，但他的生存能力還是讓人佩服。這次他反唐生智，雖未能攻下武漢，但多少動搖了武漢的根基。先讓他退到安徽吧。」

蔣介石認為夏斗寅還可以利用，決定讓這個敗將官升一級，從師長變為軍長，以使他在安徽能忠實地替南京政府的北伐出力。六月八日，夏斗寅被蔣介石任命為新編第十軍軍長，但兵力並未有大的變化。善變的夏斗寅在二十多年後，曾一度準備投靠正所向披靡的共產黨，又害怕共產黨不會容留他這個劊子手，於是逃離武漢去了台灣。這時蔣介石翻臉了，認為他通共，夏斗寅再次逃離，流落到香港。不得已，在香港六國飯店門前擺個小卦攤，給路人看相，一代鄂軍元勳病逝他鄉。

正當蔣介石為夏斗寅的失敗不快時，五月二十一日傳來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的消息。蔣皺起的眉頭立刻舒展開來，這起在表面看來是「內訌」的事變，充分說明汪精衛是駕馭不了軍隊的，唐生智的湘軍亦並非鐵板一塊。事件的發生雖與南京無關，但其意義卻與「四一二清黨」異曲同工。蔣介石心想，許克祥給了我反共一個篤定的佐證。事情很明白，無論是寧還是

漢，在反共問題上還是基本一致的。現在需要進一步視察，看看汪兆銘什麼時候能表明反共的態度。他料定，這位極左的朋友反共只是時間問題，因為武漢是撐不下去的。

汪兆銘撐不下去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經濟問題。被唐朝大詩人李白稱為「江城」、有「東方芝加哥」美譽的武漢，此刻成了一座經濟孤島。北面京漢鐵路被張作霖與馮玉祥各自截斷，南面粵漢鐵路被李濟深封鎖，長江上游航道也已經受楊森控制，長江下游則掌握在蔣介石自己手中。

實際上，對兩湖及江西、安徽的經濟封鎖已見成效，那裡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加上共產黨動輒遊行罷工，不少中外工廠、商店因而閉歇。光是漢口，到四月時已有三十萬人失業。

只要一算帳，便知汪精衛已捉襟見肘：湖北每月稅收僅一百八十萬元，為過去的四分之一，支出卻需一千萬元；湖南稅收僅七十萬元，為過去五分之一，支出需兩百五十萬元；江西稅收僅九十萬元，為過去的二分之一，支出需一百七十萬元；武漢政府發了九百萬國庫券，還向宜昌商會借貸了五百萬。維持一個政府，光靠發債券和借貸怎麼可能長久？蔣介石想：我倒要看看俄國還有多少銅鈿可以接濟武漢。

在蔣介石看來，「清黨」問題陳群他們幹得不錯，這當然離不開胡漢民親力親為的支持。胡再三強調，「『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共產黨」，看來使用胡漢民是正確的選擇。為了讓這個文官充分發揮作用，蔣介石支持胡漢民在南京政府出任了十幾個職務：國民政府主席、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宣傳部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胡展堂正夜以

繼日地工作。

第一階段的「清黨」，從「四一二」殺共產黨開始，局勢很快就無法掌控。下面的人搞不清楚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一片混亂，亂殺亂砍。據稱，各地右派國民黨分子在大街上，憑穿著和髮型判斷此人是否為左派分子和中共黨員，稍有不合，便予捕殺。

混亂的局面正是蔣介石所需要的，只有亂世，「武將為主、文官為輔」的權力格局才能顯現並穩固。蔣介石清楚，就目前情況看，要想從軍政向訓政過渡，為時尚早。不管是誰，只要是用武力奪取政權，殺戮便在所難免。現今的六十餘萬國民黨員有多少是支持我蔣中正的？黨內異己有時比黨外敵人更可怕，要想訓政，國民黨就必須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短短一個月的「清黨」行動，因為太過血腥而引發了黨內和軍隊的微詞。二兄張人杰來電提醒：除重要及陰謀分子之外，應待全國代表大會發落，務令陳群、楊虎等人毋得過事殺戮，致招反感。

對二兄的意見，蔣介石相當重視。而正在此時，他家鄉寧波發生的一件事引起他的警覺，楊虎、陳群派往寧波協助「清黨」的黃埔一期學生蔣孝先等，竟被誣為共產黨而遭拘禁。蔣孝先乃蔣介石之族侄，是要派大用場的人。聞訊後，蔣介石連忙親自過問，才把他們從刀下救回。

看來真需要對「清黨」的第二階段有所控制了。於是，他以總司令的名義發表對第二期「清黨」的意見。意見中，對第一期「清黨」給予褒獎：「第一期『清黨』為情急處分。其時共產黨徒謀叛正亟，非各地同時採用極嚴峻之手段無以遏抑亂萌。」

但對第二期「清黨」，他提醒道：「第二期則須遍及一般跨黨分子，其證據比較難得，挾嫌誣陷者易施其技。辦理稍有不慎，將增加人民之恐怖，斷喪社會之元氣，而黨務進行亦大受其影響，此不可不注意也。」他告誡：「清黨」不可「摘瓜抱蔓」。

五月五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及各部長第八十八次聯席會議通過了胡漢民等提出的《「清黨」委員原則六條》：

- 一、在「清黨」時期停止入黨；
- 二、所有黨員在經過三個月之審查再發黨證；
- 三、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及一切腐化、惡化分子，前經混進黨者，一律清除；
- 四、所有黨員須每半個月向所屬黨部報告其工作，無故一月不報告工作者，一律加以警告。三個月不報告工作者，取消黨員資格；
- 五、海外「清黨」辦法另定；
- 六、任鄧澤如、吳倚倫、曾養甫、何思源（後改為蕭佛成）、段錫朋、冷欣、鄧異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

鄧澤如被定為「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這位廣東新會人是國民黨元老，多次幫助孫中山募款鬧革命。他從來就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在世時他反對，蔣介石掌權後他還是反對。由這樣的人組織「清黨」，當然再合適不過了。

蔣介石要求中央「清黨」委員會盡快任命組成上海、廣東、廣西、福建、安徽等地的「清黨」委員會。對國民黨的組織結構做一次全面的改變，對農村黨員、基層黨員嚴加控制。在蔣介石看來，這些人的思想難以統一，而沒有統一的思想，國民黨的權勢和地位將無法做到獨大。

蔣介石還堅持認為：「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有可採者。」

在國民黨內，竟然多數同志對黨章都不知是何物，這實讓他感到悲哀。

這個階段，蔣介石有所不便，還是沒辦法將自己的理想很好地轉告大眾，原因是身邊缺乏一枝如椽大筆，而這枝筆蔣介石已經找到，就是在南昌見過面的陳布雷。他在南昌急就章寫的〈告黃埔同學書〉，完全表達出了蔣當時的思想，其中一些文字至今仍在蔣的胸中迴盪：

「黃埔莊嚴璀璨的歷史，全部是我們已死的同學用碧血染成的，我們自己不去玷污它，別人是絕不能用手來抹殺的。」「『清黨』難，清心更難。此前總理教訓我們說，諸君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心中革起。自己能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革命，便有望，可以成功。」七千多字的文章，處處散發著蔣介石的苦口婆心、諄諄教誨。如今，「清黨」必須看重從思想上肅清共產黨的影響，胡漢民連續撰寫有關理論文章，發表了〈三民主義之認識〉、〈「清黨」之意義〉、〈C.P.的手段和策略〉等，可都不是蔣介石想要的聲音。

胡漢民在〈「清黨」之意義〉中說：「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卻正當壯年……為什麼倒被這個小鬼搗亂得亂紛紛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對主義沒有徹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誘惑和威迫。」

在蔣介石看來，這樣的文字雖通俗，卻無直至人心的親切，也沒有氣勢和文采。加之他心底明白，胡漢民不過是個過渡人物，不能讓他搶了自己的風頭。已與二兄張人杰商量，無論如何請正在浙江省政府秘書長任上的陳布雷盡快來南京。有陳布雷的輔佐，不但在寫文章上自己不用費神，布雷先生還是個能幹的政治幕僚。

二兄那邊傳來消息，陳布雷答應下月初到達南京。他的到來順理成章：從浙江調任南京中央黨部任書記長。而對另一個才子郭沫若，蔣介石專門發出〈通知軍政長官請通緝趨附共產黨之郭沫若函〉。他想，鄧演達看重的這個風流才子，我蔣中正是不會重用的。

軍事上，捷報頻傳。何應欽的第一路軍在江北擊潰孫傳芳殘部，奪取了揚州，孫部已退到海州；李宗仁的第三路軍自蕪湖渡江占領巢縣，阻滯東進的直魯軍；第二路軍在孫傳芳的降將陳調員指揮下，從安徽東部的東梁山，渡江攻占和縣，大敗直魯軍杜鳳舉部。

蔣介石並未打算從前線抽調北伐部隊進攻武漢，那不是上策。所以面對在漢口的蘇俄顧問加倫關於南京要西征的來電，蔣在覆電中否認會派部隊向長江上游出擊。

加倫是北伐軍的軍事顧問，也是蔣介石個人的朋友。他擔心蔣介石會趁武漢兵力空虛攻擊武漢，這是正中蔣下懷的事，但蔣考慮的不是自己去攻，而是要讓唐生智的隊伍去攻，這支隊伍就是夏斗寅部。

看著軍事上、政治上的步步勝利，蔣介石開始運籌更大的事：蔣宋聯姻。他認為時機到了，

放眼望今中國，還有誰有我蔣中正如此的光彩？在悄悄安排好一切後，派衛士長宓熙親自到上海與宋靄齡聯繫。

宓熙到上海的那天是五月十三日，距離蔣在滬上開殺戒剛過一個月。這一天，正是效忠武漢政府的鄂軍將領夏斗寅在宜昌決定反水的日子。

在寶樂安路（現多倫路兩百五十號）孔祥熙公館，宓熙將蔣介石的親筆信交給了孔夫人。

宋靄齡看完信後，高興地對宓熙說：「是總司令約三妹十五日去焦山玩。你就住在我這裡，等十五號同三妹一道走吧。」

宓熙認為這是件輕鬆的公事，當晚去天蟾舞台看了梅蘭芳的京劇《天女散花》。第二天，他按計畫去上海火車站買票，可站長告訴他已將總司令坐過的花車調來，預備掛在十五日上午八時開往南京的特別快車後面。當宋美齡聽說此事後，嫣然一笑。

十五日上午七點五十分，宋美齡一身西式打扮，在大姊宋靄齡、女佣蔡媽的陪同下，從上海火車站登上花車。火車開動後，宋靄齡獨自返回孔公館。

列車經過近七個小時的行進，於當天下午三時許開進了鎮江車站。花車上的宋美齡透過車窗，首先看到的是月台上擔任警戒的警察，心情大好，能享受這種待遇，本身已說明許多問題。接著，她看見了身著華貴筆挺西服、頭戴一頂高級草帽、足蹬白色皮鞋的蔣介石。此前見到蔣時，他不是長褂，便是戎裝，而現在的他，完全是另一種味道，神采奕奕，既透著軍人英姿，又飽含

紳士風度。宋美齡的眼睛下意識地放光，已到而立之年的她，按捺不住自己砰砰急跳的心。

宓熙也沒想到是這樣的陣勢，在一排衛士的邊上站著公安局長俞予厚，還有不少藍衣隊的偵探在警惕地注視著四周，他立刻也緊張起來。鎮江火車站站長親自指揮列車進站，花車正好停在蔣介石面前。他走上花車，宓熙趕忙迎上來。蔣介石逕自走到宋美齡面前，微笑著用上海話說道：「三弟辛苦了。」蔣介石對宋美齡的稱呼喜歡稱兄弟，他知道宋美齡想做巾幗英雄。

宋美齡事先想了很多要講的話，但一見面卻想不起要說什麼，只說了一句：「總司令瘦了。」輕輕一言，讓蔣介石感動不已。自從離開南昌，陳潔如回娘家後，他沒近過女色，這是許多年來的第一次。就蔣介石的想法，女人也是填補內心孤獨的最佳良藥，然而為了娶到眼前這位年紀不輕、但美麗又有智慧的女人，他忍住一切為她守身。在上海兩個多月，硬是沒見心愛的陳潔如，對於沒有離開過女人的他來說著實不易。現在終於就要與這位上海社交界寵兒、多少男人仰慕的女人獨處了，其乃守得雲散見月明啊。

蔣介石握著宋美齡的手說：「自去年北伐至今，『清黨』建政，避過無數凶險，總算將總理《建國大綱》中的第一步『軍政』基本實現。為此，中正是願意肝腦塗地的。」

宋美齡用讚美英雄的口吻說：「總司令自北伐以來，進長沙、戰武漢、奪南昌、定上海，直至在南京建立新政府，一步一步，美齡都看在眼、記在心啊。」

聽了這話，蔣介石心中很是受用，感慨道：「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開始的北伐是不可倒退回去的。我說過，唯有武力才能統一中國，今天看來是正確的。」

而我本人，為實行國民革命，至死不渝。只是沒想到三弟對中正如此關懷，老實說，對三弟的才學德容，中正戀戀難忘。」

宋美齡沒再說什麼，面露羞澀，這更讓蔣介石心旌蕩漾。他請宋美齡下火車，上了停在月台上的一輛新式轎車，直奔江邊碼頭，然後換乘汽艇。不過五分鐘，便在號稱「碧玉浮江」的焦山南麓登岸。

焦山位於鎮江東北約五公里的長江之中，海拔七十七米，周長兩千餘米，乃揚子江中一個小島，是一個天然的「鎮江之石」，也是一座充滿人文風貌的島嶼。因東漢末年學士焦光不願做官，隱居在此，漢獻帝三下詔書要他出山，都被他拒不應詔。宋時，宋徽宗賜名為焦山。

甫上岸，宋美齡就問：「聽說此地是萬里長江中唯一四面環水的島嶼？」

蔣介石頷首介紹道：「奈，這個小島很有來歷，相傳東漢學士焦光在此隱居。他冬夏不穿衣，睡不鋪席，見人不語，數天才吃一頓飯，活了一百多歲。」

宋美齡莫名地點點頭，又問：「是他這種近似瘋狂的舉動，使得這個小島有了名氣和靈氣嗎？」

蔣介石笑道：「我以為是的。焦光很任性、很孤僻的原因，恐怕是他嫌這個世界太骯髒，只有隱居才是出路吧。三弟有所不知，我自己就有兩次想出家當和尚，因為我覺得跟誰都合不來，那種心情與焦光大體是相通的。」

宋美齡若有所思看看眼前這個成熟的男人。蔣介石繼續介紹：「別看此地小巧，卻有古寺、古碑、古木、古炮台。康熙來過，乾隆也來過。書畫大家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此讀過書。他有首很有名的詩：『靜室焦山十五家，家家有竹有籬笆。畫來出紙飛騰上，欲向天邊掃晚霞。』還有好多文人騷客來過這裡。相傳此地古碑中的稀世之寶〈瘞鶴銘〉碑是東晉王羲之所書……」蔣介石為此行做足了功課。

宋美齡插話道：「鄭板橋的『難得糊塗』，可以從多角度解讀啊，這是與西方哲學的不同之處。」

蔣介石聽到這話，心中一動，認為宋美齡此刻說「難得糊塗」，正是她要表達對自己的關注。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悉的蔣介石深諳「聰明易、糊塗難」的道理，在他那裡，中庸的基礎是愛、廉、謙、謹，如果做不到這些，則何談中庸，又何談糊塗，更別說面對目前這一大堆如亂麻般的政治權謀。他沒有直接回答宋美齡，而將話題一轉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的入侵，已經將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等原有的優越倫理破壞了。」

宋美齡笑道：「總司令的民族主義精神讓美齡欽佩。」

一行人過山門——「不波亭」，向東走去，呈現眼前的是千年古剎定慧寺。看看綠瓦朱柱，古楓參天，宋美齡驚嘆道：「從江上看，很難發現此處會有如此雄偉的廟宇。」

蔣介石也笑道：「三弟有所不知，鎮江有三山，焦山、金山、北固山。焦山碧波懷抱，滿山蒼翠，山寺大多被蔭雲林叢掩映，故有『山裏寺』之說；金山有白娘子的傳說，那裡的寺廟依

山而造，殿堂樓台層層相連，遠望只見寺廟不見山，所以有『寺裏山』之說；北固山上的甘露寺，相傳是三國劉備招親的地方，很是浪漫，甘露寺雄踞山頂，那裡更有『寺冠山』之說。就三山而言，焦山顯然比另外二山更具自然氣質，乾隆第三次到焦山時，就詩云：『若以本色論山水，我意在此不在彼。』」

宋美齡微笑著點頭，心中不斷泛著甜甜的波浪，那波浪是愛情之水，不間斷地在心海中翻騰著。她知道眼前這位總司令日理萬機，按常理不該如此附庸風雅、兒女情長，可為了我他卻這麼做了，這只能說明他對愛認真了。想到此，宋美齡的臉上微微泛紅。

定慧寺原有規矩，未婚少女不得在寺留宿，但此刻的蔣介石非一般常人，已經沒幾個和尚的定慧寺斷不敢為難這位擁兵自重的大人物，兩人得以破例入住寺東的觀瀾閣。這也非一般住處，是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第三次下江南時住過的行宮。

走進月亮門，一幢精緻的二層小樓出現在眾人面前，一株百年楊樹將綠蔭布滿小巧古雅的庭院。

宋美齡不禁以英語脫口出：「My god! So beautiful!」

看著宋美齡高興的樣子，蔣介石鬆了一口氣，知道選擇這個地方與宋獨處是正確的。

蔣介石此前雖與多名女人有過肌膚之親，卻從沒有自由戀愛過。元配是母親作的主，二房是與盟兄陳其美在風月場瞎鬧遇上的，三房陳潔如是死纏爛打趁她父親去世而得到的。所以對這

次與宋美齡的約會，他格外重視和興奮。

在接下來的八天時間裡，兩人在焦山不大的範圍內早出晚歸，足跡踏遍此地的每一處古蹟。此時中國正處戰亂年代，島上幾乎見不到遊人，只有遠遠跟著他們的衛士們。

蔣介石從小受母親影響，對寺廟有種特殊敬畏。他帶著基督徒宋美齡遊遍了定慧寺周邊的十八個庵寺，每到一處都浴手拈香，禮佛祈願。而入鄉隨俗的宋美齡，對蔣介石戎馬生涯背後的了解，便是從禮佛開始的。她多了一個心眼，這個信菩薩的男人，肯為自己而改奉基督嗎？宋家可是對上帝無比虔誠的。

這天，兩人來到焦山古炮台。這座炮台建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距此已八十七年，是清政府為了加強長江防務而建。炮台位於焦山東麓，八座炮台面對長江呈馬蹄形分布。

蔣介石領著宋美齡走進一座炮台遺址。宋美齡撫摸著牆壁說：「中國建築有自己的特點啊，因地制宜，點石成金。」

蔣介石拍了拍牆壁說：「三弟在國外多年，想必對西方建築有所了解，但依舊不忘中國之本，實屬難得。炮台的建築是用黃土、石灰、細沙配糯米漿搗拌成三合土，然後分層鞏固夯實，這種連成一片的暗堡式的整體，異常堅固。」

宋美齡笑道：「我聽說總司令在日本留學時做過炮兵？」

蔣介石答道：「是的。我從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到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

入伍。那個時候很苦，軍官們對士兵就像對待奴隸牛馬。後來武昌首義爆發，奉大哥陳英士召喚，我離開了日本軍隊，回國革命。」說到這兒，蔣介石又感慨地說：「從軍兩年，對我的影響很大。我也從一個朦朧的普通青年，成為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革命鬥士。」

幾天來，宋美齡斷斷續續從蔣介石的話語中得知許多信息，她愈發感覺這位軍人所經歷的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其實正是一個英雄的成長史。她看看炮口所指方向，那裡是浩瀚的長江，她問：「揚州在哪個方向？」

蔣介石用手朝左邊指指：「在焦山的正北面。」話一出口，立刻意識到眼前這位千金小姐為何要如此一問，馬上說：「就在士衛長代表我去上海邀請三弟那天，我已下令北伐軍對孫傳芳殘部，還有所謂的直魯聯軍發動總攻，我、何敬之、李德鄰分別任三路大軍總指揮。此刻，敬之將軍的第一路軍已渡過長江，正在向揚州進攻。你看！」蔣介石指著炮台外，接著說：「在我們的西北方是瓜州，我的軍隊已將它拿下。應該說，在蘇皖大地，北伐軍正所向披靡，我們在此地的安全不會有任何問題。」

宋美齡笑道：「我才不怕呢，有總司令在呀！不過我還真想去前線看看將士們是如何建功立業的。」

蔣介石誇獎道：「古人云：巾幗不讓鬚眉，三弟之勇氣可嘉。焦山有副對聯說的好：『三山鎮京口，此地鎮長江。』想我數十萬英勇男兒一定能打出威風，保護婦孺，並底定江北。」

宋美齡感慨道：「這是一個需要英雄、也必定產生英雄的時代，中國人將重樹自信。」

蔣介石被她的話感動了，如此心智高尚的女人如何不讓人動心？他的腦海裡閃過與他有夫妻關係的三個女人：毛福梅、姚治誠、陳潔如。她們溫良恭儉，卻沒一個能與眼前的宋美齡相比。她可以是伴侶，更可以是同志啊！

蔣介石真誠地說：「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箝子無依，是母親用鐵一般的嚴規戒律管束我，鍛鍊了我頑強的意志。我對她言聽計從，絕不忤逆。母親已去，老天卻又給我帶來了你。三弟，你一定要留在我的身邊。」

宋美齡打趣道：「我身上唯一具有東方特點之處就是我的臉，你崇尚儒教，能接受我的西方作風嗎？」

蔣介石想想說：「我對三弟說過，中國有著優越的倫理，這種優越當中最大的特點是包容。我相信，三弟西方的作風一定會被博大的中國文化所感動。如果將兩者融會貫通，豈不是珠聯璧合？」

宋美齡開心地笑了。沒想到這位指揮千軍萬馬、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人是這樣討人喜歡，恐怕沒有女人會不仰慕這樣的英雄。在她心中，蔣介石已然成了一個非凡的人，一個她愛的人。

觀瀾閣樓上的長廊，蔣介石讓人在此置一個几、兩把籐椅，與宋美齡坐在這裡品茗觀江。知道宋美齡愛吃有骨頭的東西，特意從南京帶來鴨五件作為茶點。見宋美齡啃得津津有味，蔣介石樂呵呵地笑了。

宋美齡見蔣介石面前僅有一杯白水，問：「你只喝白水？」

蔣介石點點頭：「多年習慣。」

宋美齡再問：「也不吸菸？」

蔣介石搖搖頭。

宋美齡有點不好意思道：「我……我是抽菸的。」

蔣介石一擺手：「知道知道，三弟請便，不必介意。」

宋美齡笑笑拿菸，想想又停住，說道：「現在不想抽。」

蔣介石微微一笑，心道：「聰明的女人。」他轉移了話題：「大姊都好嗎？」

宋美齡答道：「她很好，我的事她比我還著急。」

蔣介石點頭：「大姊是個有思想、善決斷、又充滿人情味的人。她知中正的鴻鵠之志，我很願意與她交流對時局之看法，傾聽她的意見。」

宋美齡笑道：「我二姊對你可不怎麼認同哦。」

蔣介石也笑笑，說：「孫夫人的政治主張，我認為是受了鮑羅廷等人的蠱惑。中正堅持認為，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說到此，蔣介石的火氣忽然上來了，有些激動地說：「中國革命需要統一，只需要一個黨，不應有兩個黨；只需要一個主義，而不應有兩個主義。我在民國十四年就講過，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就是要造成中國共產黨為正統黨，他們絕不信國民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此次在上海『清黨』實屬無奈之舉，因為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

皆為共產黨，我不得不防啊。」

對蔣介石易怒的脾氣，宋美齡早有耳聞，如今眼見為實。但在她心裡卻認為：一個有壞脾氣的男人，也比一個沒脾氣的男人要好些。她順著蔣介石的話，但巧妙地避開再談她的二姊：「我與鮑羅廷交談過幾次，對他的主張和觀點不能接受。這個人蔑視人性，冷酷無情。」

宋美齡的話，一下把蔣介石的思緒拉回到年初的武漢。鮑羅廷竟當面威脅要打倒他，這樣的人絕不可以放過。蔣介石說：「鮑羅廷等人想通過欲擒故縱的辦法，讓中正喪失人心，以達到削減我權力之目的。我率將士在前方拚命，有人卻在背後扯後腿，其心何其毒也，更無道義可言。中正強烈感受到，被蘇俄接濟如同吃牢飯，吃不飽也餓不死，所以，我再三請宋部長幫我。」

宋美齡見蔣介石提到哥哥宋子文，內心一熱。當年孫中山搞第一次廣州起義時的軍費，有一半是父親宋耀如籌集的，那是為了支持孫中山。現在北伐，蔣介石又請我們宋家幫忙。對這位長兄她很佩服，只在廣州擔任了一年財政部長的子文，就使國民政府的收入猛增至八千多萬元，難怪二姊夫孫中山那麼看重他，而蔣介石也急需這位金融權威的支持。可子文固執得很，看上蔣中正，他的目光與大姐比真是差遠了。想到這兒，宋美齡也欲擒故縱地說：「我的這位大哥在廣州實行苛政，招來不少非議。」

蔣介石擺擺手道：「李德鄰曾說宋部長是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績是非實無法定論。但中正的看法，可以定論。沒有他的經濟基礎與保障，北伐不可能做到如此無後顧之憂。民國十四年八月仲愷先生遇刺，九月廣州掀起擠兌風潮，宋部長兩天兌出毫銀四十餘萬，平息了擠兌，紙

幣的信用大大提高。遺憾的是這樣的人才還非我所用。」

宋美齡說：「大姊一直在和他談，相信他會對南京政府有好感的。」

蔣介石點點頭：「但願。他的婚姻問題怎麼樣了？」

宋美齡答到：「好像有一段姻緣正在興起。去年大哥與二姐路過廬山，他想給媽咪在廬山建一幢別墅，巧遇了一位工程監理的女兒叫張樂怡……」

蔣介石打斷她的話：「宋部長不是一直與盛家七小姐相愛嗎？」

宋美齡搖頭，這位大哥的戀愛曾讓宋家蒙羞。

十年前，宋子文歸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漢冶萍煉鐵廠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辦事處秘書。「漢冶萍」乃當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公司，總部经理盛澤丞（恩頤）是公司創辦人、洋務派骨幹、大資本家盛宣懷的四子。因為宋子文工作熱情，條理清楚又英文流利，盛澤丞便請他做妹妹盛謹如（愛頤）的英文老師。

十七歲的盛謹如是盛家當家人莊夫人的親生女兒，排行老七，是媽媽的得力助手。她見多識廣，伶牙俐齒，以「盛七」之名聞名上海灘。

並未出過國門的七小姐，很快被舉止談吐儒雅得體的宋子文傾倒，莊夫人便派家中老僕去打聽宋家家事。那位狗眼看人低的奴才回來稟報說：「宋家是廣東人，信基督教的，父親是教堂裡拉洋琴的。盛宮保的女兒不可以嫁給這樣的人家。」莊夫人一聽如此的門不當戶不對，便讓盛

澤丞想辦法。

於是，盛家老四一紙調令，把宋子文調到漢陽本部當會計處科長。宋子文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一氣之下辭職，跳槽到了聯華商業銀行。之後又連續跳槽，直到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三月，陳炯明兵變被平定，二姊夫孫中山召喚他去廣州，並委以重任，籌辦中央銀行。

宋美齡想到這兒，說：「盛家女人當家，目光短淺。他們根本不知道孫中山的價值，不知道宋子文作為孫中山小舅子的價值，當然也想不到蔣總司令會成為宋家的好朋友。」

蔣介石「哦」了一聲：「自杏蓀先生（盛宣懷）仙逝，盛家『天下第一官商』的稱號便每況愈下，武昌首義的起因跟他盛家亦不無關係。依我看，盛家的幾個兒子都缺乏乃父風範，真不知莊老夫人走後，盛家會是什麼樣子。」說到這兒，蔣介石又問：「宋部長與張樂怡小姐定了婚期嗎？」

宋美齡說：「大哥已過而立，媽咪為他的婚事著急。如果可能，下月他們會結婚。」

蔣介石忙說：「到時三弟一定通知我。」

宋美齡認真地說：「總司令軍務繁忙，能陪我這幾天，美齡已不好意思，怎敢再煩勞呢？」

蔣介石笑道：「感謝三弟的理解。中正知道令兄對南京政府以及我本人還有誤會，但我相信，這種誤會一定會消除，南京政府對宋部長這樣的人才也會一如既往地期待，這也是為了實現總理建國大綱的需要。遺憾的是，現在還有很多人理解我，甚至不理解革命。」

宋美齡點頭。她被眼前這位軍人俘虜了。從外表看，他遠比二姐夫英俊；從內心看，他堅忍，有原則，更有責任感。宋美齡說：「有個義大利人寫過一部著作名叫《君主論》，書中說：人民是沒有判斷力的，他們往往依靠一種經常聽到的輿論來建立他們的看法。」

聽了這話，蔣介石內心一動，說：「我在見到總理之前，認為革命的宗旨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後來總理指正我說：革命的宗旨應該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我在想，公要靠什麼來維護？很簡單，靠道德來維護。人民儘管沒有判斷力，但他們很清楚自己要什麼，他們要天下為公啊。」

這番肺腑之言，讓宋美齡再次感動，說：「我拜讀過總司令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你在晚上冒極大風險坐小艇上岸給二姊夫買日用品，真的讓我感動。你的勇氣和行為就是一種公啊！」

蔣介石堅定地說：「中正堅信，沒有孫先生，就沒有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每日做事，中正都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宋美齡說：「人生實為一大冒險，而作為革命領袖，恐怕順應時勢、迎合眾心是唯一之要件。」

蔣介石感慨道：「三弟說得對。順應時勢、迎合眾心，這也是辯證的關係。我說過，不懂得辯證法，就沒有革命的資格。要想辯證地做到這八個字，還需要輿論支持。好在布雷先生就要來南京，他可以幫助我把輿論的問題拉起來，我也好專心致志地北伐，盡快將中國統一在三民主

義的旗幟之下。為此，我再三懇求三弟能留在我身邊。」

面對蔣介石這種方式的求婚，宋美齡春心萌動：「你閃亮射人的眼睛告訴我，你是個英雄，但你跟我說要我留下沒有用，要我媽咪同意才行。我的家庭是基督教家庭，我們都聽父母的，如果我媽咪同意了，我再考慮。」

蔣介石立刻用堅定的口吻說：「一言為定！中正定會請求老夫人答應你留在我身邊。我也相信，身為宰相徐光啟之後裔的老夫人一定會通情達理。」

宋美齡笑了，說：「但二姊我說服不了她，大姊準備請譚延闓先生來說服大哥，他很信服譚先生。」

蔣介石似乎看到了曙光，不禁握住宋美齡的手戀戀不捨地說：「我期盼這一天早日到來。」

眨眼到了兩人分手的時間。這八天中，蔣介石無時不在關注局勢的變化。武漢方面沿京漢線一路向北，勝仗連連，奉軍已全線崩潰。

但最讓人頭痛的是汪精衛與馮玉祥的關係，他們兩人背後都站著蘇俄共產黨。幸虧張作霖在北京搜查到大批蘇俄暗中分化中國的文件，才讓馮玉祥聯共有所顧忌，而汪精衛也吃了不少蘇俄的苦頭。

五月初，南京宣布二次北伐，比武漢晚了十二天。那是因為所有的情報都告訴蔣介石：唐生智、張發奎主張東征消滅立足未穩的蔣介石。如果四月寧漢戰爭爆發，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也就談不上二次北伐。直到四月十九日，武漢方面舉行了北伐誓師大會，來自西面的危險暫時消除，蔣懸著的心才放下。

但蔣介石很快弄清了汪精衛的意圖：與馮玉祥聯手，打敗奉軍；再聯合山西的閻錫山，由馮玉祥領頭繼續北伐；武漢北伐軍則轉向東南，與南京開戰。

這樣的如意算盤在蔣介石看來是可笑的，唐生智、張發奎會團結嗎？以多變著稱的西北軍馮玉祥會聽你汪兆銘的？武漢可以與馮玉祥在鄭州會師，我蔣中正難道就不可以與馮玉祥在徐州會談？夏斗寅的倒戈，許克祥的反叛，都說明武漢方面正在走向劣勢。倒是另有一件事需要未雨綢繆，即如何啟動與西山會議派的合作？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又與嚴防目前合作良好的胡漢民有關。

蔣介石站在鎮江車站的月台上，不斷向遠去的花車揮手，他派宓熙務必將宋美齡安全送回上海。

焦山之行收穫頗豐，蔣介石開始思考如何處理陳潔如的問題。他知道，能妥善處理好這個問題的人只有一個，就是二兄張靜江。要抽時間與二兄談談。

關於焦山之行，有文獻指出：子虛烏有。因為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五月十八日，他從南京到上海參加陳其美殉國紀念會。那天上午七時，列車到上海後，他沒有去會場，而是先去看望了宋美齡。如果蔣宋有焦山之行，也應該是十八日以後的事。

但從已披露的蔣介石日記來看，從六月五日到七月六日之間，蔣宋二人來往異常密切，雙方進入到相思的階段，期間宋美齡第一次給蔣介石寫了信。除了信件往來，七月三日晚，兩人還在上海鄉下的一家小餐館吃飯；七月五日晚，蔣介石帶宋美齡乘車在上海兜風到深夜一點。蔣介石往返上海參加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典禮、宴請上海商界頭面人物時，都要抽時間與宋美齡歡聚。

在戰爭間隙、政權不穩之時，兩個對時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男女突然之間如此地親密，應該有一個觸發的契機。這個契機很可能就是焦山之行，只是具體行程，人們還在探秘。但有一點可以下結論：領袖的私生活是會影響其工作。

還有一個佐證：蔣宋二人對焦山都有特別好感。有記錄稱，一年後的六月十三日，已贏得北伐戰爭的蔣介石與愛妻宋美齡同遊鎮江焦山，且捨不得離開，他們是故地重遊嗎？這一次，蔣介石在焦山對宋美齡表示想辭去總司令一職，卻被宋美齡批評為「性質消極」，沒有男子氣概……

當東去的列車越走越遠時，蔣介石帶著衛隊登上了回去的列車。今天，他還要趕去南京給改組的黃埔軍校同學會代表大會演講。

講什麼呢？蔣介石隱約感到，這是一次機會，可以講講西山會議派的問題，吹吹風。

胡漢民昨天在改組會上講了話，題目是〈以親愛精誠的精神，鞏固我們黨的基礎〉。聽上去似乎是大談黃埔成就，可字裡行間卻透露出一種氣息：他胡漢民也與黃埔熟稔。他想幹什麼？

黃埔同學會這次改組，是蔣介石親自安排曾擴情、鄧悌等弟子辦的，目的是讓黃埔系更純

潔，更具有自豪感，更有效忠於校長。這是「清黨」後要辦的重要事體，而且這件事絕不能允許別人染指。在這多事之夏，更要小心有人背後插刀子。

蔣介石想起胡漢民曾寫過「綠垂靜路要深駐，紅寫清陂得細看」的條幅，這是宋朝宰相王安石的詩句。關於南京，王安石另有一首〈泊船瓜州〉的七絕：「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樣的句子大概只有我蔣中正當得，他胡展堂如何當得，怕是他真想反客為主吧？

多疑的蔣介石想起他曾一直反對，但從未真正被打倒的西山會議派。

此刻，國民黨內部有三個中央：分別是汪精衛為首的廣州國民黨中央（現為武漢國民黨中央）、西山派組織的上海國民黨中央，以及蔣介石控制的南京國民黨中央。胡漢民雖是名義上的南京國民黨中央首腦，但蔣介石要幹任何有關黨務的事，他都是一道重要關卡。已令陳果夫籌辦中央黨務學校，可遠水無法解近渴。在蔣介石心中一直有個搞不清的問題，究竟是汪精衛利用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利用了汪兆銘。同理，當下是我蔣中正利用了胡漢民，還是胡展堂在利用我？有一點他是曉得的，此次為定都南京而抬出胡展堂的目的很明確：對抗汪兆銘。但絕不能讓胡展堂乘機長硬翅膀，再反過來對付我。可是，誰能在這種時候制約他呢？現成的人選當然是西山會議派。

對於半年來的全國形勢，蔣介石有深刻認識。軍事上，奉系張作霖、孫魯聯軍，還有吳佩

孚殘部，加上北伐軍不和，馮玉祥、閻錫山的崛起，一團亂麻，有槍就是娘。政治上，在英、日等列強虎視眈眈中，黨爭不斷，北京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加上西山會議派，還有正在悄悄崛起的共產黨，各行其道、相互謾罵。如今士氣之浮，黨爭之烈，比宋末明末均有過之，誰能真正為國民政府設想呢？好在政也好，軍也罷，細細分來只有兩派：「清黨」派與聯共派。只要在一個共同的主義下，短暫的妥協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建國目標已然凸現，取得的成果正是妥協的結果。張作霖是公開贊成「清共」的，殺李大釗、囚鮑羅廷太太就是證明，而且他還有信來聲明支持「清黨」。在全國，持聯共牌的只有汪兆銘與武漢政府一家，正是他們持有這個觀點，將成為他們必敗的原因。

善於充分利用各派政見，並為己所用，是蔣介石屢試不爽的慣用做法。

西山會議派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了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參會的十三人中有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多為居士學者。這是一個右翼政治派別，其政治主張便是「清黨」，認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他們宣布成立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並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廣州中央針鋒相對。

當時在廣州的汪精衛、蔣介石等是堅決反對這個組織的。民國十五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

民黨二大上，西山會議派被彈劾，一批人受到黨紀處分，其骨幹鄒魯、謝持被永遠開除黨籍。並指出：這些人的存在足以危害本黨之基礎，阻礙國民革命之前途。會上還通過了「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決議。

但在羽翼未豐的蔣介石心裡，西山會議派並非十惡不赦，他的兄弟戴傳賢曾參加了西山會議派的籌備會，說他們只是在碧雲寺總理靈前誦經念佛。而且「中山艦」事件後，西山會議派立刻發來了支持蔣介石的電報：「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但蔣介石為了自己的目的，回電謝絕了他們的恭維，只說自己「唯革命是從」。

在隨後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前，他通過戴傳賢等人，邀請西山會議派的兩名骨幹邵元沖、葉楚倫赴粵。正是這兩個人，成為了此次上海「清黨」的重要參與者。為了掩人耳目，在「四一二」行動方案中，有封閉西山會議派在上海所有活動場所的內容，但執行命令的白崇禧心領神會，西山會議派毫髮未傷。

現在，到了用他們來同時制約汪、胡二人的時候了。在黃埔同學會代表大會上，蔣介石預先定下的演講重要觀點，便是對西山會議派表示諒解。他已決定委任邵元沖為青年部長，葉楚倫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並盡快恢復林森、張繼、謝持、鄒魯等人的黨籍。

當時，蔣介石並沒有預料到，胡漢民的政府主席身分只維持了五個月，根本無需防備。他也沒料到自己在離開焦山後，三個月內會被迫下野。幸好預先布好的西山會議派這枚棋子，在他下野期間有力地阻止了汪精衛擴權，使寧漢合流成為汪兆銘的竹籃打水……

整個六月到七月初，北伐戰事都進行得比較順利。南京北伐部隊三路大軍按預定計畫向北推進，六月二日，第三路軍前敵總指揮、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占領了徐州，這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得知消息後，蔣介石立即開始著手處理兩件事：與日本保持溝通和聯合馮玉祥。北伐軍眼看就要進入山東境界，如果汪兆銘不搞小動作，實現這個目標沒有問題，但日本在魯的利益將受到威脅。

五月一日，蔣介石致函在上海的盟兄黃郛，請他自己或派人赴日一次，進一步解釋北伐的目的和目標。五月十二日，蔣方震、劉厚生受命赴日本，會晤四月二十日上任的新首相田中義一。五月十三日，黃郛推薦曾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商人袁良，以民間人士的名義與日接洽。

果不出所料，五月二十九日，上海日本領事矢田發表日本出兵山東的聲明。五月三十日，北京日本公使芳澤發表同樣的聲明。五月三十一日，兩千日軍自滿洲進抵青島。

而在同一天，張作霖決定放棄鄭州，退守豫北、直隸、山東。

正當蔣介石深感震驚猶豫之時，六月一日，傳來了田中義一與袁良見面時表示的三點意見：一、青島日軍非不得已不開赴濟南，如赴濟南亦不干涉一切；二、南軍（北伐軍）得徐州後勿猛進，北方交與馮玉祥、閻錫山；三、相信蔣中正為收拾中國之唯一人物。

對田中義一這位軍人出身的新首相的承諾，蔣介石並不相信，但他曉得，當下是不能與日本人弄僵的。張作霖雖與日本的關係千絲萬縷，可這個綠林鬍子出身的軍閥也不十分相信日本人，

相互猜疑。如果北伐軍與日本人幹起來，勢必導致張作霖聯日之死心踏地，北伐勝利將可能無望。只有與日本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讓日本人出師無名，張作霖又處於猶豫之中，才能完成北伐大業。但對倭寇在中國的蠻橫，一定不能放過。目前要保持與日關係，恐怕還須有新的動作。他一邊派人與日本保持關係，一邊令南京外交部長伍朝樞發照會，抗議日本出兵山東。

但田中的意見，讓蔣介石與馮玉祥聯手的想法愈發強烈起來。他猜測，張作霖、馮玉祥等一定也在與日本人溝通。對蔣介石來說，現在最大的敵人不是北京政府，而是武漢政府。武漢政府的血統是純正的，汪兆銘的頭銜也是公認的。日益膨脹的唐生智、張發奎等軍人拱衛著武漢，隨時有東征的可能。只有穩住馮玉祥，拉攏閻錫山，才能暫放北伐改為西征，徹底粉碎武漢這個正統的政府，讓南京成為中華民國的真正首都。他盤算，如何與馮玉祥接洽？

五月三十一日，馮玉祥搶先攻進鄭州，而武漢北伐軍六月一日才趕到鄭州。六月二日，南京方面的北伐名將王天培在大敗直魯軍於夾溝後，占領號稱「北國鎖胡、南國門戶」的華夏九州之一：徐州。接著傳來汪兆銘與馮玉祥在鄭州會面，並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最大的買賣是將豫、陝、甘三省交於馮玉祥，武漢北伐軍開始南撤。汪兆銘等人對馮玉祥讓步目的只有一個：集中兵力對付南京。這樣的信息對蔣介石來說是絕對的壞消息，他再次想起盟兄黃郛。南京政治會議已於五月十六日通過任命，黃郛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曾參與了馮煥章的「北京政變」，還代理過內閣總理，可以透過他盡快與馮煥章接洽。

六月十一日，蔣介石的奉化老鄉、多次在北京政府任職的王正廷自上海趕到南京，他被黃郭推薦前去開封會見馮玉祥。

對這位具有極高外交水平的老鄉，蔣介石很滿意。當年在巴黎和會上，正是他拒絕在辱國的和約上簽字。他在黎元洪政府任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期間，與俄談判，完成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前期工作。現在由他去找馮玉祥，應該不成問題。蔣介石要王正廷向馮玉祥表示合作的願望，並可按馮的要求提供部分軍餉。

對馮玉祥的拉攏，蔣介石早就用的是雙保險。年初就派人給馮玉祥送去過五十萬銀元，而此前，又通過日本振武學校的學長、年長他七歲的江西人彭程萬去做馮玉祥的工作。彭是辛亥老人，留日期間就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是經黃郭介紹在馮玉祥軍隊中客居，與馮交情甚篤。他的意見，相信馮玉祥能聽進一二，加上王正廷的正式磋商，不信馮玉祥不回頭，更何況還有孔祥熙這張王牌。

果然，六月十四日，馮玉祥發來電報，看似在極力調解寧漢矛盾，字裡行間卻清楚地透露出他的思想和打算。電報說：「日前，唐孟瀟（生智）同志南返，臨別與弟兵鄭重表示，絕不與蔣公為難；如與蔣公為難，我輩將自革自命，又何以對革命二字？均囑弟轉達。」

看到電報後，蔣介石一顆懸著的心放下了。兩天後，他自南京去徐州，名義上是赴前線督戰，實則此行是與馮玉祥見面，由曾經是馮玉祥重要助手的李鳴鍾隨行。

十七日，蔣介石致電南京，請胡漢民、吳稚暉、黃郭、張靜江、蔡元培等文官速專車來徐州，

他自己則與李宗仁等一批武將在徐州專候馮玉祥。

按馮玉祥的算盤，此次會面安排在河南首府開封比較妥當。但蔣介石堅持在他的地盤——徐州會面，馮玉祥的善變著實讓他害怕。

馮玉祥的臨陣變卦讓不少大人物領教過，其中直系巨頭、孚威上將軍吳佩孚領教最為深刻。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總統曹錕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馮玉祥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他的進軍路線是出古北口，在喜峰口一帶迎擊奉軍。

臨出發，馮向曹錕獻計，大軍離京，恐城防有誤，建議將與馮玉祥親密無間的孫岳第十五混成旅，調入京師擔任城防。糊塗的曹三哥，不但不同意，還委任孫岳為京畿警衛副司令。

當玉帥在石門寨、山海關等地與奉軍激戰之時，馮玉祥卻把部隊分為五個梯隊，逐次出動，並密令部隊盡量拖延時間。大戰前，他拿到了張學良派人送來的五十萬軍餉，又見到了段祺瑞的代表袁良。於是，這位總司令命令部隊改稱「國民軍」，後隊變前鋒，以一晝夜急行軍兩百二十里的速度殺回北京。孫岳大開城門迎接「國民軍」進城，曹錕被自己任命的馮總司令囚禁，直系就此被推翻。眼看要獲勝的吳佩孚，猝然失去了方向，直墜萬丈深淵，從此再無力興風作浪。

總理孫中山也領教了一回，就是這一回，孫先生有去無回。馮玉祥占領北京後，將溥儀趕出了皇宮，消息傳到廣州，孫中山異常興奮。「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原本就是他的終極目標，他認為實現自己建國大綱的最佳時期到來了。收到馮玉祥請其北上議政的電報後，他幾乎將廣州

政府的文官全部帶上，滿懷喜悅，隆重北上。可等孫中山一行十二月十四日到達天津時，馮玉祥早被調兵進京的段祺瑞、張作霖逼下了台。興奮不已的孫中山被迎面潑了一盆冰水，肝癌發作，不到三個月，壯志未酬身先死。

如今，有「民國保母」之稱的鮑羅廷又將領教一回。是鮑羅廷安排下野的敗將馮玉祥去蘇俄考察的，正是這次考察，馮玉祥得以重新翻身。當他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秘密離開待了幾個月的蘇俄時，得到蘇方軍餉和槍枝彈藥的援助，使他得以於九月十七日在內蒙五原成立以西北軍為班底的國民聯軍。當他得陝甘、出潼關、奪鄭州後，卻要求汪精衛立刻驅逐鮑羅廷。

蔣介石對馮玉祥幾起幾落的戎馬生涯以及他獨裁廉政的治軍方略、以身作則的行為作風都有好感，也佩服得很。可當下，不僅僅是佩服，而是兩人需要更加惺惺相惜。當馮玉祥決定十九日離開封前往徐州時，為了保密，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陳調元等，乘專車從徐州向西約六十公里，在位於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院北小車站——黃口，迎接馮玉祥。

黃口站原是不出名的小站，十九日這天，突然將星閃耀、冠蓋如雲。儀仗隊、軍樂隊在站台上整齊排列，這一切都是為迎接西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南京任命）、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武漢任命）、國民革命聯軍總司令（自封）——馮玉祥的到來。

馮玉祥為了這次見面也煞費苦心，選了五百士兵當衛隊，專車出了開封先向西邊的鄭州行駛了一段，然後調頭東進，經蘭考直奔黃口。

這都是為了保密，因為此時離他與漢方在鄭州達成一致才剛過七天。與寧方未達成協議之前，他並不想過早讓輿論、特別是漢方知曉。

當馮玉祥的專列緩緩進入黃口站時，軍樂大作，革履佩劍的將軍們整肅衣冠，翹首以待。然而，專車上只有士兵不見司令，士兵們紛紛用手往後指。眾人忙朝後看去，一節掛在專車最後、裝運馬匹貨物的鐵皮車門口，有位大漢正滿臉笑容向月台上的人們招手。

李鳴鍾急忙向蔣介石介紹：「那位便是馮總司令。」蔣介石帶著眾將迎上前去。

這是兩個人首次見面。一生衣著嚴謹的蔣介石絲毫沒有介意馮玉祥的穿著：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製軍裝、一雙布鞋、腰束皮帶。

相互介紹後，蔣介石喊了一聲：「大哥。」馮玉祥則回了一聲：「兄弟。」兩人激動地擁抱起來，此刻的他們不僅是上下級、兄弟的關係，更是兒女親家的關係。

馮玉祥顯然被眼前的一切感動了。他沒料到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如此謙恭，不禁感慨地說：「總司令地位甚高，卻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呀。」

見馮玉祥滿意的樣子，一絲不苟的蔣介石微笑著說：「久仰煥章大哥之英名，迎出徐州，一來是尊重大哥要求保密的願望，二來也是想早一點見到大哥的風采。現在一見，好一個布衣關東大漢。」

馮玉祥哈哈大笑，說：「我們真是相見恨晚啊，總司令所做一切無不使玉祥敬慕。」

一千人上了蔣介石的專車，一直晤談到徐州九里山站。然後換乘汽車進入市區，下榻位於東門大街的花園飯店。

這一路，善於察言觀色的蔣介石已基本摸清馮玉祥的思想、動向。

此人很願意北伐。將張作霖逐出關外、消滅孫傳芳與直魯聯軍，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還能出出被奉軍打敗的氣。他也願意反共，想撇清與蘇俄的關係，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一定也讓他感到害怕。而他顯然不願意現在就與漢方決裂，表面看是他不願看到國民黨自相殘殺，實則他想左右逢源，一柱擎天。

原本想拉他一致行動對付漢方，先滅了唐生智、張發奎，再向北討奉。看來這個想法行不通，蔣介石決定擱置這個想法，只提出讓西北軍在其管轄的範圍內「清黨」，同時以西北軍為主力討奉，並要求已南撤的漢方軍隊再次加入北伐，這樣可減輕南京所受到的軍事壓力。如此要求，馮玉祥應該能答應。

走進花園飯店時，蔣介石對馮玉祥說：「大哥，當年黎宋卿（元洪）與段芝泉（祺瑞）之爭，辯帥張紹軒（勳）乘機復辟大清，帶三千辮子兵從徐州進京前，就是在這家飯店籌畫復辟的。」

馮玉祥四處打量後笑著說：「那時我正被段芝泉革職在天台養病，其實我沒病。多虧辯帥進京復辟，我馮玉祥又有了用武之力，拿回了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的指揮權，他段芝泉再也奈何我不得。」

蔣介石恭維道：「煥章大哥當年為討逆，典押自己的房產用五千元作軍費，讓小弟佩服。而隨後率先攻進京師，迫使張紹軒掛出白旗，也讓小弟景仰。」

馮玉祥不好意思地搖搖頭說：「可惜那次沒有肅清帝制禍根，過了七年，我才讓鹿鍾麟驅逐了清廢帝溥儀出宮。」

蔣介石沒有往下說，他不知馮玉祥是否介意臨陣倒戈坑害吳子玉的所為。後來吳子玉再也不信任馮玉祥了，曾在馮認錯的信函上批了四個字：「全體繳械」。

十九日當晚，蔣介石在花園酒店盛宴為馮玉祥接風洗塵，在徐州的所有將領都出席作陪，這又讓馮玉祥大為感動。

席間，蔣介石致歡迎詞，他用帶著濃濃寧波口音的官話說到：「此次南北軍事領袖把臂言歡，商洽黨國大計，意義十分重大，是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頁。讓我們熱烈歡迎了不起的大英雄、勞苦功高的馮總司令！」

馮玉祥也激動地致答謝詞：「直奉的軍閥每當說到南北赤化頭子，都提到蔣介石和馮玉祥。其實我們何嘗赤呢？我們的赤是赤心、赤膽、赤手，是為著赤子們去革命。現在兩赤見面，就是為了救中國，這是第一集團軍的功勞，我很欽佩。」

沒有資料顯示，這次見面兩人是否討論了蔣經國與馮弗能在莫斯科的婚事。

美國《時代》週刊在四月二十五日以〈痛斥父親〉為題，報導了蔣經國在蘇俄對父親的譴責；

蔣介石堅信僅十七歲的兒子是不可能如此的。他同時知道，一年前兒子已與馮玉祥的長女馮弗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居成婚了，這種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行為，在蔣介石看來是不孝行為。但他沒想到，在緊要關頭，竟會與親家馮玉祥聯手，不得不說這是命中注定。

馮玉祥從蘇聯回來不久，應該很清楚自己女兒嫁給了蔣介石的兒子。不知他是否跟第一次見面的親家介紹了孩子們的情況？（馮蔣家對這一段婚事從未承認。）

趁著酒意，蔣介石給了馮玉祥一張五十萬元的支票，說：「這是給大哥的一點小意思，犒賞犒賞西北軍的兄弟們！」拿到錢的馮玉祥很高興。靠上蔣介石，該不會再為急速擴張的軍隊糧餉發愁了，漢方還答應每月撥付九十萬呢。

蔣介石一直微笑者，但他不會忘記，第二次直奉大戰，張學良的五十萬元軍餉，使馮煥章的天平傾斜，臨陣倒戈……

六月二十日，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等一票文官如期而至。馮玉祥又見到了多年的老朋友黃郛，兩人高興地握手言歡。

徐州會議在花園飯店正式舉行。會議開了一天半，討論時間主要集中在二十日，吳稚暉擔任會議主席。在他的主持下，雙方分別討論了八個方面的問題：黨的問題；目前政治建設問題；對付共產黨的辦法；繼續北伐問題；武漢政府問題；政治部改良問題；國民會議準備問題；軍事問題。

蔣介石牢牢把握會議的走向。他心裡明白，八個問題中值得討論的就是「清黨」和「北伐」問題，其餘都是桌面上官僚扯皮推諉的問題。一切都在蔣介石預料中，雙方很快就「清黨」和繼續北伐的問題達成一致。

蔣介石在會上提到：「十八日，張作霖已在京就任大總統，確定了安國軍政內閣。他通電要討赤到底，說凡以此為目標者均為同志。」

馮玉祥不屑地說：「鬚子的話如何可信？他自己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樣的軍閥非劃除不可。他的討赤，與我們提出的『清共』有本質不同。一句前，共產國際的羅易從漢口來電，要求我與漢方立即聯手摧毀南京，奪回廣東。這是有意製造分裂，玉祥決計不能同意，也不能袖手旁觀。」

蔣介石點頭同意，他聽得懂這話的意思。馮玉祥打擊奉系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蔣中正不打奉系，他也可以聯合他人來打我。蔣的心中雖有不快，但提醒自己不可衝動。他想，既然沒有永遠的敵人，當然也就沒有永遠的朋友。只要目標一致，不管是敵是友都應該聯合，此次會議成功的基礎就是聯合。馮玉祥要打奉，我蔣中正要打汪，而打汪的最大理由是汪通共。但對馮煥章，要小心。

這次見面最為重要的實際問題不是這八個表面問題，而是不能放上桌面的其他問題，比如軍費問題。二十一日上午，蔣介石突然查覺馮玉祥有異樣，這個善變將軍的態度似乎在發生動搖，蔣心道：不好！這是個緊要關頭，絕不能出差錯，便忙請黃郛等去詢問。

傳回的信息讓蔣介石鬆了口氣，馮玉祥表示經濟有所困難。這在蔣的意料之中，不給馮玉祥經濟資助，光憑什麼主義，西北軍是不會跟南京走的。蔣介石已經算好了一筆帳，如果馮玉祥獨當一面，讓寧方能有時機打擊漢方的話，從七月起每月可接濟他軍費兩百五十萬。

馮玉祥對這個數字非常滿意，態度愈發堅定起來。二十一日，會議向外界正式發出了兩個通電：

一是蔣馮聯合聲明：「我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國之平等自由……乃滿清遺毒未除，帝制變形之軍閥遂起……我國民革命軍，爰繼續總理之遺志，應民眾之要求，誓師北伐。中正、玉祥偕吾同胞，轉戰數萬里，前茲猖獗一時之軍閥，已次第崩摧……茲當會師魯、豫，更益進行之際，謹掬誠悃，為海內外告：中正、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凡百誘惑在所不顧，凡百艱難在所不避，凡百犧牲在所不惜……武力為民眾之武力，成功即民眾之成功。惟我同胞同志，實共鑑之。」

二是由「清共」的積極推進者——吳稚暉起草的馮玉祥個人通電，這份名為〈勸汪譚諸氏速決大計〉的通電，主旨是要漢方加緊「清黨」，並驅逐俄國人。通電說：「前在鄭州與諸兄分途晤談，綜合意見……前方苦戰奮鬥之將士，力不能保護其在鄉之父兄……補救之方：鮑顧問既經解職，亟宜設法使鮑回國。在武汪之國民政府委員，除願出洋暫資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等語……而寧方同志聞之，無不悲喜交集，一致歡迎……值此風雨飄搖之際，千鈞一髮之秋，既異地而同心，應通力而合作……諸同志苟一念及先總理在天之靈及武裝同志歷來作戰死者未埋，殘

者傷者未癒，以及北方民眾日呻吟宛轉於奉魯軍閥鐵蹄之下，必須集合吾黨全力，一致對外……孟瀟（唐生智）努力革命，祈調集所部於鄭州，以與玉祥所部將士，協力北伐……」

會議達成了合作作戰方略：第一步先肅清革命軍境內之敵，如趕走鄂西的楊森、吳佩孚等（因楊森與吳佩孚勾搭，使得蔣介石既要像利用夏斗寅一樣利用他，但也要打壓他，不能讓他出川）。第二步北伐，津浦線以靳雲鶚、陳調元為主力，京漢線以馮玉祥為主力，同時動員山西的閻錫山、商震出戰（閻在月初已自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懸掛青天白日旗），與京漢、津浦兩路會師。

對於這樣的結果，蔣介石是滿意的。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半，馮玉祥向蔣介石等辭行返回開封。蔣介石握著馮玉祥的手說：「祈盼大哥馬到成功。」

馮玉祥也鄭重地說：「如果漢方不肯合作，玉祥絕不會袖手旁觀，隨時抽出兵力以援兄弟之需。」

蔣介石感激地說：「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馮玉祥的聲音斬釘截鐵。

在與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後，二十三日，蔣介石下達肅清魯南要害的作戰令，對日照、臨沂、臨城、台兒莊、棗莊、金鄉等地實施攻擊，同時命令劉峙的二師、衛立煌的第十四師、陳誠的第二十一師南撤，以應付長江上游漢方的軍事。這三個師全屬何應欽的第一軍，是蔣介石的嫡系。

布置完畢後，蔣介石立即趕回南京參加已開幕的中央財政會議，這個會議對於桂、閩、浙、皖、粵、蘇六省的稅收劃分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蔣介石答應二十五日到會講話。

而馮玉祥則根據徐州會議精神，立刻開始「清共」；此事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蘇聯在《北京協定》中表示，不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可實際並非如此。張作霖抓捕李大釗時搜查到大量文件，證明蘇聯正在陰謀「赤化」中國，引起了各國公憤。馮玉祥琢磨，需要趕快撇清與蘇聯的關係，加之「清黨」可快速與蔣汪結盟，可謂一舉三得。

他把東西北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和他管轄地區內的地方共產黨幹部集中到鄭州開會。宴請了這兩百四十多人後，宣布說：「你們到我這裡幫忙，你們要反蔣，我是不幹的，我要和蔣先生合作反張作霖。在我的軍隊裡，穿二尺半的（軍服）不能反蔣；你們要反，願意到哪裡就去哪裡吧。」

然後發給川資，科長以上每人一百元，其餘每人五十元。這其中包括孫良誠、孫連仲、馬鴻逵、石友三等部的政治部主任宣俠父、陶新畬、劉志丹、方廷楨，還包括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長鄧希賢（小平）、總司令部警衛師師長史可群等。

隨後，馮玉祥用一列悶罐車皮，將這兩百四十多人往南送出三百多里，拉到大別山與桐柏山之間的重要隘口武勝關外，請他們下車。後來，這批人中大多數繼續往南去了武漢，其中包括

劉伯堅、鄧希賢。

在被遣散的這批人中，官最大的是劉伯堅，時任國民聯軍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前，馮玉祥在蘇聯考察求援時，正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的共產黨員劉伯堅參加接待，並受馮玉祥邀請到國民聯軍任職。蔣馮合流時，他剛結婚兩個多月，所以馮玉祥對他特別關照，給了一千元。八年後（一九三五年三月），劉伯堅在江西嶺南中彈被國民黨俘虜，就義前寫下了著名的詩歌〈帶鐐行〉：「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拚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七月二十八日，被汪精衛解職的鮑羅廷到達鄭州。馮玉祥已接到汪的密電：扣留並槍斃鮑羅廷等人。馮玉祥冷哼了一聲，你汪兆銘在使借刀殺人計啊！為給自己留條後路，馮特意要鮑羅廷回俄後說明自己與蔣介石合作的原因，畢竟蘇俄曾為他提供過總額上億盧布的支持。七月三十日，馮玉祥派專列送鮑羅廷一行從鄭州至西安，並再往前，直到鐵路盡頭，使這位帶著巨大失落的俄國顧問經蒙古安全返回蘇俄。

六月二十二日召開的南京中央財政會議對蔣介石來講極為重要。北伐之初，軍費開支全靠廣東，由宋子文主持財政維持，蔣的妹夫竺之珊還去當過廣州佛山的籌餉委員。南京政府成立後，宋子文尚在搖擺，蔣介石必須從依靠江浙財閥的臨時做法中盡快轉向長期穩定的財政控制。他明白，打仗不能只靠贊助和借貸，更不能大增貨幣發行，而應該從現有的通貨中分離出軍費，分離的主要手段就是：稅收！

他請國民黨元老古應芬出任南京政府代財長，古氏曾在國民政府財長廖仲愷被暗殺逝世後，兼署過財長。經驗老道的古應芬上任之初，立刻擬就了國家地方收支劃分暫行標準，確定了中央與各省的財政關係。

經過三天商討，會議將應收稅目暫定為三十四項，其中鹽務稅、關稅、菸酒稅、所得稅、交易稅等十八項稅目屬於國家收入；田賦、契稅、屠宰稅、漁業稅、營業稅等十六項稅目屬於地方收入。

納入國家支出的項目有中央黨務費、陸海軍航空費、外交費等十九項；地方支出的項目有地方黨務費、公安及警察費、地方教育費等十四項。

會議編制了《劃分國家地方收入暫行標準》、《劃分國家地方支出暫行標準》。會議決定自七月一日起，捲菸徵稅百分之五十；從八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這一切為日後宋子文接任財長打下了良好基礎，也為隨後蔣介石從軍政到訓政、國家經濟進入「黃金十年」做好了準備。當然，把持國庫的重任還是要由自己人擔著，蔣決定派親妹夫竺芝珊出任國庫主任（此人十六歲就到蔣介石家的玉泰鹽鋪學生意，後被蔣母看中，做了蔣家女婿）。

二十五日，剛從徐州返寧的蔣介石蒞臨會議，發表了兩千六百多字的講話。
他首先熱情洋溢又不無擔憂地說：

「今天我同各位相見，非常快活……各位都明白，無論軍事政治，是離不了經濟的運用……國民政府遷到南京以後，第一要緊的就是要統一財政……現在還有因習慣的關係，財政機關被軍

人把持著的。以致政府委了徵收人員，被人拒絕到任……

我敢對各位講一句：如果各省的軍隊還有這種病根，像總理做大元帥的時候，各軍把持財政，政府收入絲毫沒有，反要仰給予各軍，使政府變為各軍的贅瘤，這是萬萬不能允許的。」

接著，他講了建設與軍費的關係問題：「有許多人說，人民負擔這樣重，而毫無建設，得不到一點利益。這是什麼緣故？這是因為革命期間北伐費用正急，實在是談不到建設……各位也可以作進一步想，因為我們現在多出一個錢，就是換取將來更有希望的建設。所以不論負擔如何重大，只好忍耐下去。今日的苦痛，絕有償還的一天。換句話說，就是將來快樂的代價。」

他給大家算帳並提要求：「我剛到南京的時候，就和軍需處長說，今年非有一萬萬八千萬的收入，不能過去……款子仍要由各省來籌畫……在革命期間，絕不可以用呆板的方法來辦理……只要大公無私，盡忠職守，什麼都可以不顧的。」

蔣介石最後說：「希望各位能把財政會議的議決案切實做到，任勞任怨，不避謗讟，造成一個廉潔政府。」

蔣介石與同僚們都清楚，稅收是需要時間的，還必須同時採取募捐與集資的方式來暫時解決南京政府襁褓中的財政問題。一個月前已經採取了極端的募捐方式，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了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拿到了二十五萬銀元的捐款；綁架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三歲兒子，拿到五十萬元的捐款；還以「反革命罪」逮捕了不少資本家商人，效果都不錯。現

在憑空每月要付給馮玉祥兩百五十萬，必須趕快動員集資。蔣介石還意識到，經過多年軍閥混戰，所有人都希望國家走向穩定，銀行家更是如此。所以發行國庫券和公債的集資手段均由金融界先行墊款，以快速取得效果。

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一份報告中說，在六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資助馮玉祥。

財政會議尚未落幕，便傳來漢方決計東下的消息，蔣介石立刻命令派兵赴安慶抵禦。此時，躊躇滿志的他甚至預感消滅漢方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一面維持北伐，一面思量如何給漢方致命一擊。此時的蔣介石在一般民眾看來依舊是呼風喚雨，上海的國民黨員正在籌備舉行第二次歡迎蔣總司令大會，以及慶祝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紀念大會。七月六日上午八時，他在閘北冒著滂沱大雨檢閱了二十六軍駐護全體官兵，在訓話中對二十六軍在「清黨」運動中的作為大為嘉許，要求「全體將士要保護今日之光榮，來完成國民革命」，同時號召「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他還明確指出：「要打倒共產黨，實現三民主義。」他解釋說，「共產黨不打倒，國民黨不能健存，三民主義不能實現……」

五號晚上，蔣介石還在外交大樓以「一杯淡酒、一盞清湯、一碟點心」宴請了包括虞洽卿在內的兩百多滬上官商界重要人物。明為感謝請教，實則表示「清共」也是為了保護上海的商家。在隨後的張靜江、黃郛的講話中，則重點呼籲商家購買政府期票，以助蔣總司令完成孫總理遺願。

此刻的滬上，到處是「蔣總司令萬歲」的口號。

但是，精明的蔣介石忽略了正與他緊密合作的桂系，不知風雲就要突變。

李宗仁、白崇禧把此前發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兩人白手起家拿下廣西，不是憑運氣就能拿到的，桂系從來就絕非甘於做臣子。他們見南京政府成立後，好像沒什麼他們的事了；當蔣與馮聯手，桂系更覺得自身不安全，便開始謀劃如何替代羽翼並不十分豐滿的蔣介石。

關於兩人的默契，坊間有個謎語，謎面是：「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兩人，是兩人又是一人。」謎底便是「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短短一年北伐，桂系在戰場上由一個軍發展成三個軍，兵力超過了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而且以「鋼軍」自居，戰鬥力也實際超過蔣的學生軍。

當北伐軍在執行「肅清魯南要害」的作戰令，進攻臨沂時久攻不下，蔣介石開始改變作戰計畫。先讓第一軍鄧振銓、顧祝同的部隊南調，葉開鑫的四十四軍接防。接著又以漢軍東下為由，命令進攻魯南的北伐軍由攻勢轉為守勢。這些戰場上的改變，使李宗仁、白崇禧改變的機會悄然而至。

當蔣介石與李宗仁商量如何能西拒唐張、北守魯南時，李宗仁小心地說出心中醞釀已久的打算。他知道，這個打算一定一定不能讓老蔣看出破綻。他說：「要想對付武漢精銳，我軍亦應在安慶、蕪湖之間以精銳之師迎頭堵截，建議將第七軍自前方調回。」講到此，李宗仁悄悄看了看蔣介石，見他面無反應，便接著說：「但如果抽回已深入魯南的第七軍，北軍勢必會反攻，四

戰之地的徐州無險可守。不得已時只能放棄徐州，等解決武漢方面的問題後，再作北進打算。」

不知是由於何種目的，蔣介石居然沒看出桂系的背後用意，同意了李宗仁的意見，點頭說：「德鄰，我同意第七軍回師，但徐州不能放棄。從軍事上分析，我們可以壯士斷腕，但你考慮沒有？如果主動放棄徐州，不僅助長奉軍的氣焰，還會給北伐軍內部的士氣帶來很不好的影響。」

兩人最後商定，桂系第七軍回師，部置在南京以西的安慶、蕪湖一帶，守徐州的任務交給北伐名將王天培。

而在此前，蔣介石已就如何抵抗漢軍給總參謀長朱紹良發去一封詳細的作戰部署電報，要求他速與何應欽詳細商量並制定具體計畫。

在這封電報中，蔣介石提出了八條應該注意的細節，比如，應如何對付沿長江東下的唐生智、程潛：「程潛入浙部隊，不知與入皖南張部（張發奎）齊頭否？如係齊頭，則張部到徽州，程部可到嚴州，唐部可到安慶。我軍應先以主力擊破入浙之程軍，而後利用鐵道運兵回寧，以對付張部……」他還預設了決戰地帶，如：南京城附近、蕪湖一線，安慶、徽州、嚴州一線。他很看重安慶，認為：「如安慶不破，則江南逆軍即不敢輕進。而我軍應付，乃有餘裕矣。」他不忘保存自己的實力，要求以第一軍為總預備隊，並特別要求朱紹良與何應欽專門研究交通、給養等作戰問題。

而這些問題，原本應該是由前線指揮官根據戰場變化而決定如何處置。蔣介石這種身在後方卻深入一線指揮的習慣，成為他在戰場上最終敗給共產黨的關鍵因素之一。

蔣介石密切注視搖搖欲墜的武漢方面如何用兵。他認為，漢軍出師無名，說什麼我蔣中正控制黨軍，什麼人民「只知蔣介石，不知國民黨」，那都是屁話，不足以開戰。反過來，只要汪精衛容共，就有打擊他的理由。

在運籌對漢作戰的同時，蔣介石曾於七月十二日給正在興頭上的馮玉祥發去電報：「馮總司令煥章：電悉。武漢兵力已集中九江，想無悔禍之意，其對兄馬電，無效可知；此時彼已進攻，弟不欲發何宣言；如為黨國與北伐計，此時兄可否以嚴正態度，對武漢作最後之忠告；如其不從，則應直取武漢，殲除共黨根據，使本黨早日統一，以蘇全民也。」

電報發出後第三天（七月十四日），便從武漢傳來「清黨」的消息，顯然是汪精衛得到了馮玉祥承諾的結果。

這個結果使蔣介石死死握住的汪精衛親共的把柄頃刻間無影無蹤，反倒讓桂系偷著樂。此時，他尚不知更大的危險正在湧動，而且已無聲地向他撲來。

桂系主力迅速撤回，聽命於白崇禧的周鳳歧第二十六軍被擺在南京附近。李白二人給唐生智發去電報，指出：「不管長衫佬（蔣介石）贊成與否，我們主張合作。」並開始散布「武漢既已分共，就應該歡迎汪精衛來南京」的信息。

而此時，何應欽的主力遠在海州。原先決定撤回的劉峙、衛立煌、陳誠等，回撤緩慢。善於觀察且敏感的蔣介石根本沒想到，何應欽——他這位出生入死的朋友，此刻也在動搖。

這一切與不久前蔣介石讓陳果夫給何應欽發的一道秘密訓令有關聯。當時命令他指揮第一

軍第一師、第三師等部隊，對桂系在上海地區的部隊實行繳械，但第一師、第三師正駐紮上海，暫歸白崇禧指揮。何應欽拒絕了這麼做，並專程到南京面見蔣介石陳述執行這一命令的困難，理由是由蔣桂實力相當，一旦動手，恐武漢漁翁得利。

這個消息隨後就被李白兩人得知，嚇出一身冷汗，原本就防著蔣的他們對蔣更加不放心了。到七月下旬，南京已處在李白的隱形控制之下，而且何應欽還存有靠攏桂系的苗頭。

這時，新的南京政府亦不平靜，胡漢民從來就不甘心處於黨政首腦的虛尊地位。通過北伐以建都南京，他看清了蔣介石「以軍治黨」的路線，是否能反其道而行之，「以黨治軍」呢？如果能行，則可實權在握。他開始醞釀黨權與軍權該如何轉換。

儘管武漢國民政府軍委決定分三路東征（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慶；一路由贛東攻浙江；一路由鄂東攻皖北）的信息已在掌握中；儘管已請張發奎的老上級陳可鈺寫信勸說張發奎不要東進；儘管吳稚暉等人發出通電，指責汪精衛反蔣完全是由於個人恩怨，有意分裂等；儘管馮玉祥警告武漢，如強行東征，他將出兵武漢。但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

觸發點是直魯軍開始猛烈反攻，徐源泉、許琨的部隊七月十九日攻入徐州東北面的臨城。而直魯軍敢於進攻的直接原因就是李宗仁南撤。

留守前線的南京北伐軍第十軍被擺在綿延百里的津浦線上，根本無法抵擋直魯重兵。北伐名將王天培敗下陣來，往南直退到安徽宿州的符離集。

軍事和政治上已頻顯頹勢的蔣介石這時才忽然感覺不妙，他急需用一場勝仗來挽回丟失的優勢。直魯軍的大舉反攻，客觀上已造成打一場大仗的環境。

當十九日臨城失陷消息傳來後，他便立刻召集軍事會議，部署以徐州為起點的反攻，以振聲威。然而李宗仁勸阻，並表示部隊產生思鄉之情，缺乏鬥志。顯然，桂系不願將南撤部隊再揮師北進。

蔣介石倔強固執的性格再度呈現，心道：你李德鄰不是居功自傲嗎？你們不是想看我蔣中正的笑話嗎？我打給你們看。他說：「自立之道，乃由剝而復，事在人為，察往知來，理有可信。克復徐州是北伐的職責所在，絕不能放棄。」

不知蔣介石出於何種考慮，也許是整個七月一切都順，自己就職一週年紀念、北伐一週年紀念、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等，似乎全體黨員都敬重他。他居然果斷地把南京的軍政大權交由李宗仁代為主持，自帶第一軍的一個師奔赴前線。

當心情不好的蔣介石帶著陳誠的二十一師二十五日起到離徐州三百多里的蚌埠時，徐州已在前一天被王天培不戰而棄。蔣介石壓根兒就不知道，第十軍戰敗的重要原因居然是：久戰疲乏的第十軍已數月未發薪餉，被雇佣的官兵多怨聲載道，元氣大傷。可蔣介石卻未欠過軍隊的糧餉。

到這時，風光無限、躊躇滿志的蔣介石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領袖欲極強的汪精衛叫囂，武漢乃正統的國民政府，而且支持他的人很多；而自己在南京已無嫡系部隊（他的第一軍主力在白崇禧的干擾下，至今也未南撤）；往前打，又無精兵可調。面對困境，他清醒地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放手一搏。二十六日下達收復徐州的作戰命令，他親任總指揮，正面攻擊徐州。可他的主力除陳誠二十一師外，其餘只能依靠原本是北伐勁旅、如今卻是屢敗屢戰的第十軍。他要賭白崇禧會不會在戰鬥打響後，還退滯不前、處於觀望。如果白崇禧積極，收復徐州尚有希望。第二件事是請已到南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的陳布雷準備辭職宣言。他想出「引退讓賢，促成寧漢團結」的一招，這也是蔣介石在急要關頭為自己準備的一條後路。

二十七日，蔣介石給王天培發電報：「王總指揮天培：貴軍須照作戰命令進行，不得推諉。吾兄素稱壯者，豈可自餒。否則革命精神一失，何以對總理而報黨國，請兄以後勿再作怯弱之辭。革命黨員貴在百折不回，臨危受命，勿存苟免之心也……」

然而，一切都晚了，失去了後方的蔣介石，註定無法打贏這一仗。十七天後，他開始了平生第一次被逼下野的生活。

